



LUOZAI XIONGKOU
DE MEIGUI

落在胸口 的玫瑰

——20世纪中国女性写作

文红霞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LUO ZAI XIONG KOU
DE MEIGUI

落在胸口
的玫瑰

文红霞 著

20世纪中国女性写作

L2006.7
w631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落在胸口的玫瑰:20世纪中国女性写作/文红霞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305-06571-2

I. 落… II. 文… III. 妇女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当代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3636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落在胸口的玫瑰——20世纪中国女性写作
著 者 文红霞
责任编辑 张婧妤 编辑热线 025-83593963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人文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9 字数 240 千
版 次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06571-2
定 价 27.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个人简介:文红霞,女,1972年生于湖北秭归,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化研究。现为河南理工大学文学与传媒系教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已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出版有学术专著《跨文化的女性言说——当代美国华裔女性写作研究》。

作者邮箱:yage13@163.com

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wenyage>

自己的声音

女性主义研究专家李小江在《解读女人》一书中痛彻肺腑地说：“我痛苦地意识到，在孩子的啼哭声中，在琐碎繁忙的家务劳动中，做事业的意志不得不经常让位于过日子的本能，刚烈的秉性不得不向忍受生活的韧性低头——于是，我落入了一个陷阱，一个历史的女人的陷阱。”“不愿放弃，就要背起。我决定自觉地背起这种命运，我感到又落入了另一个新的陷阱，一个双重的角色，双重负担，双重人格的当代女性的陷阱。”“双重角色引来双重标准，像一把双刃剑，把女人割裂了，使她们无论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上都无法找到一个轻松、真实的自我。”我之所以引述这么多，是因为这段话道出了所有职业女性的辛酸苦累。双重标准来自社会的严苛，它并不因女人承担生育而多一些理解和关怀，反而对女性多了嫌弃和歧视。如果事业和家庭之间面临两难抉择，而孩子对母亲的需要和女人天性中无私的母爱也会使女性主动放弃自己的事业。往往男性可以义无反顾地离家去冲刺事业，而女性很难作出这样的选择，她不舍得也不放心，事实上也很难离开。当然，社会也认同这种选择。

当女性决定将两副重担都挑起时，意味着将付出更多的辛劳，更预示了两种结果，一是皆大欢喜，她以韧性、毅力和才干为自己和孩子都打出了一片湛蓝的天；一则很可能两方面都照顾不好，自己身体也累垮了。这种生存现实使女人不再是女人，而是女人加男人，它让女人比男人背负起更多的责任和辛劳。

这是一个有梦想的女人的宿命。女人必得结婚，必得生育，也必得



实现梦想，因此她所付出的代价将几倍于男性。生育改变一个女人，将女人真正还原为性别意义上的女性，身体的心理的，母亲的角色几乎是重新塑造了女人。我从怀孕那一刻起，就发现了自己的改变，我变得温柔忍耐，坚韧勇敢，我的心中充满爱，对孩子的、对亲人的。那时，我才真正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让我无法割舍，他让我愿意付出我的所有来对待他。我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地把我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给了我的孩子。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无比清晰地体会到了事业女性的伟大与辛劳。于是，在当母亲的艰难中我形成了自己的女性观。

女人是天生的，从降临人间那一刻起上天赋予的生理特征，到当母亲后所体味到的人生滋味，构筑成一个全面的女性生命体，使女人的女性特征逐渐丰富深邃完善。一个女人无论多成功，有多大声名，她都会把当母亲作为自己最美的追求。爱的激情转瞬即逝，声名的荣耀不过是过眼云烟，高高在上的地位有可能让自己更加孤独。而从孕育生命的那一刻开始，孩子就与母亲的生命息息相关，十个月的腹中相伴，生下来后的抚育照料，这种爱的付出比哪一种爱都更为深刻，孩子是她生命的一部分，是一枝长在母枝上的小树，每一次贴近都是同样的心跳，别样的温馨。一个没有当过母亲的人研究女性文学是不完整的，一个没有深深爱过自己孩子的女人研究女性主义也是不透彻的。“女性”一词不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它有着丰富深邃的内涵。“女性”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是女人自己，也是社会的一份子。任何一个女性都不可能只成为其中的一项而置其他为虚无。她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都驱使她变得圆融、明净、厚重。一个有勇力的女性是不怯于承担重任的。相反，她视责任为生命的必需，视苦难为生命的营养，视爱和成功为生命的追求。

一个人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和社会，也无法超越自己的环境和日常琐碎的生活，这样的人只有在妥协中寻求进取之道，尽可能去协调身边的人和事，使它们有益于自己的发展，而不是偷偷绊你的脚。这样才有可能使自己更优秀，才能善用自己的智慧取得杰出的成就。当然，隐

忍绝不是软弱无能,女性面对恶毒和陷阱、迫害和压制应坚决反抗。同时,女性对自己的才能和可能取得的成就应有相当的自信,不管别人怎样评价或者产生怎样的非议,甚至遭到阻止,都应坚强面对,尽最大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所强调的是女性意志和个人心态,一个成熟的女人是战无不胜的。只有当她在事业追求和日常生活都能敞开心胸去面对时,生命的魔力、智慧的光芒、梦想的花苞才会灿烂地绽放,自由地舒展在蓝天白云之下,风来舞蹈,雨来欣悦。其实过什么样的生活,成为怎样的女人,全靠自己去想象、去选择。我始终认为自信、坚韧、理性、圆融、跳跃、天真是一个女性成功的必要素质。

我选择用生命阅读的视角来解读 20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是想给自己更大的自由,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博大的心胸去思考、去审视这个时代的女性作家如何看待世界、自然和自我的种种人生课题。我的评论熔铸了我的生命体验,我坚持从自己心中出发,说出我的观点。因为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同样需要激情的澎湃,生命的涌动,它也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心与心深刻而激烈地碰撞。

行文过程中也许难免有失偏颇、公允,请各位学者专家批评。

文红霞

2009 年 8 月 31 日

于河南理工大学栖霞斋

目 录

- 001 · 序：自己的声音
- 001 · 导论：从被诅咒的嫦娥到跳来跳去的“作女”
- 005 · 第 1 章 出走的困境
 - 009 · 第一节 自然精神：庐隐和丁玲
 - 025 · 第二节 生命意识：萧红和张爱玲
 - 054 · 第三节 家园情结：冰心与杨绛
- 069 · 第 2 章 规范与罅隙
- 078 · 第 3 章 历史与反思
 - 079 · 第一节 诗意守望：女性诗歌的崛起
 - 092 · 第二节 呼唤人性：戴厚英、严歌苓
 - 104 · 第三节 现实批判：谌容
- 109 · 第 4 章 欲望与救赎
 - 111 · 第一节 言说疾病：毕淑敏
 - 126 · 第二节 迷幻花园：徐小斌
 - 138 · 第三节 写实与虚构：方方、池莉
 - 163 · 第四节 迷狂的情与性：王安忆、张抗抗
 - 188 · 第五节 诗意栖居：迟子建
- 206 · 第 5 章 跨文化写作
 - 210 · 第一节 女性生命本体的探问：虹影
 - 215 · 第二节 母女纠葛：谭恩美
 - 247 · 第三节 视角旋转的瑰丽：严歌苓
- 274 · 参考文献
- 277 · 后记：玫瑰在歌唱

导 论 从被诅咒的嫦娥到跳来跳去的“作女”

在创世神话里，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夏娃，让他们无知无欲地生活在伊甸园，然而夏娃听信了蛇的花言巧语，偷吃了智慧果，从此有了羞耻之心，惹得上帝大怒，将他们逐出伊甸园，使整个人类受到牵连，从此有了生老病死。潘多拉是宙斯为了惩罚人类而创造的一个女人，他送给她一个装满灾难的盒子，潘多拉忍不住好奇之心打开了盒子，于是灾难弥漫人间。

在中国上古神话“嫦娥奔月”里，美艳绝伦的嫦娥嫁给了神勇善良的丈夫后羿，但她抵挡不住飞翔的诱惑，背叛了丈夫，私吞不死神药，飞上了月宫。谁知月宫里只有荒凉空漠，于是“托身为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在女性主义者看来，这是典型的男权话语，是父权时代对出走女人的恶毒诅咒。想要奔赴新世界吗？门儿都没有，等着变成丑得令人毛骨悚然的蟾蜍吧，独自品尝“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滋味吧。

在这些故事里，女性是卑微的，她们的特征被描述为轻率，缺乏理智。而忘恩负义、自私绝顶、唠叨、抱怨、虚荣、小心眼、歇斯底里、撒谎、不可理喻等词汇则成为女性

的专用隐语与代名词。但无可否认,这些被贬损的女性有勇气探索彼处为何物,渴望去发现和创造,她们身上蕴藏着改变世界的巨大能量。

在男权话语书写中,我们听不到嫦娥、夏娃、潘多拉这些女人的声音,不知道她们的所思所想。女性在文学作品里,要么是贞女烈妇,要么是红颜祸水、狐狸精。在这种暗示或压抑下的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幽闭深院,弹琴绣花,就像西蒙·波伏娃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

只有女性自己的写作、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行动,才能摆脱他人意志的强加,真正表达出自己的心声。从被书写到书写自己,从被言说到发出自己的声音,“嫦娥们”走过了漫长的千年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飓风催醒女性意识,开始让女性反省自己到底是谁。张爱玲、苏青、萧红、丁玲等一个个优秀的女作家脱颖而出,她们从传统道德、世俗习惯里一点点挣脱出来,建立女性自己的言说。

然而千年来的苦难历史,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终结的。从丁玲《梦珂》中梦珂和女作家萧红的遭遇里,我们悲凉地发现,女性追求自由的结果不是《伤逝》中子君的死亡,就是梦珂、萧红那样的身心俱伤。所以萧红痛彻肺腑地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这种状态到了20世纪90年代开始被迅猛突破。女作家们意识到要想真正获得自由,获得社会地位,仅仅反思苦难是不够的,必须建构女性自己的生活,塑造全新的女性形象。“作女”就是20世纪90年代后女作家倾情塑造的“新嫦娥”形象。“作女”们普遍受过高等教育,聪明美丽,时尚优雅,独立强悍,在光怪陆离的都市里游刃有余。她们是这个物欲时代的弄潮儿,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穿梭于超市商场美容院健身房之间,生活得高贵从容。她们不再依附男人,不再像传统女性那样仰男人之鼻息生活。相反,她们对社会和男人了如指掌,故而能呼风唤雨,为所欲为。女性的直觉和敏感帮助她们利用每一个到手的机会,

完成自己的梦想。

例如张抗抗《作女》中的卓尔，都市白领，有着不菲的收入，但是她从不安于现状，总想颠覆世俗规范，只听从内心的召唤。她频繁地换工作，一时想去南极，一时又去寻找翡翠鸟，在她身边有一大群能作善作的女朋友。不管生活得是幸福还是不幸，轰轰烈烈是她们唯一的追求，她们也因为能作而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铁凝《大浴女》中的尹小帆，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与一个美国男人结婚，移居美国，离婚后再找条件更好的男人，用她姐姐尹小跳的话说，就是以不断地参与不断地破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王安忆笔下的阿三、王绮瑶都有类似的特征，她们都在近乎焦躁的跳来跳去中寻找自我，寻找属于女性的位置。

林白、陈染小说里的林多米、黛二小姐、倪拗拗则是“作女”中的变异，她们沉湎于自我，充溢着敏感、锋利、反叛的情绪。她们渴望爱情，追寻纯而又纯的爱情，如果得不到，就选择背身而去的决绝姿态，就成为带有女巫气息的向男人复仇的妖女。卫慧、棉棉、安妮宝贝作品中那些沉迷于酒吧歌厅的女主人公，则在与男人的周旋中寻找爱和生活信仰，一次次失望，一次次寻找。实际上也是在用特立独行的方式“作”，貌似另类，实则有相似的气质和生活轨迹，更重要的是有一样的女性独立意识。

而“怨妇”形象的塑造则可从更深层面看出女作家的女性意识。在她们作品里出现了一系列被丈夫抛弃的女性形象，唠叨、虚荣、小心眼、多疑、歇斯底里、神经质等是她们的标签。在她们的思维定势里，男人是她们的天，是她们的地，除了男人之外她们一无所有，所以她们在婚姻悲剧来临之时不知所措。我们来看看池莉《来来往往》中对林珠和段丽娜爱憎分明的塑造。林珠在男人世界里自由腾挪，精明强干又足够风骚性感，后者不是为了取悦男人，而是为了更大限度地获得利益。她看上了康伟业就大胆追求，康伟业无法离婚，她就卖掉康伟业送给她的房产，拿着几十万远走高飞。而段丽娜呢？则是传统女性意识的牺牲品，她辅佐康伟业成就了事业，年老色衰了被抛弃，此时她想捍卫自己

的家庭和爱情,使用的手段是老土的一哭二闹三上吊,但又显得那么力不从心。同样的怨妇形象还有王安忆《逐鹿中街》的陈传青,王海鸰《中国式离婚》中的林小枫等,她们一天到晚疑神疑鬼,草木皆兵,害怕丈夫有外遇。

耐人寻味的是,女作家对这类怨妇形象并没有给予同情和怜悯,而是用嘲讽的姿态写出她们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中的落伍,甚至表现出了比男作家更甚的憎厌之情。因为在她们看来,这类女性是在等待怨叹,而且无所作为。她们要么深陷情感沼泽,视野狭窄,坐井观天,眼中心里只有那个属意的男人;要么徘徊怅叹,寻寻觅觅,“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她们在时光之河中浮沉,总在寻找“那个谁”,期望他能为自己撑起一片无雨的天空,而不是寻找自我救赎。而这些消极的表征正是已经被当代女作家们所摒弃了的女性意识。

从历史深处、上古神话里款款走来的“嫦娥们”,已不再只是被观看被诅咒,她们找到了自己的声音,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以强悍的姿态向世界宣布:女人并不是依附男人的小鸟,女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到幸福!

第 1 章 出走的困境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群可谓是群呈璀璨,除了鲁迅、林语堂、沈从文等优秀男作家,还涌现出了庐隐、冰心、萧红、张爱玲、丁玲等各具姿采的女作家,她们用独特的人生践履和风格各异的文学作品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辛亥革命的爆发推翻了千年帝制,但并未动摇封建文化与意识形态本质。直到 1919 年,以“科学、民主”为旗帜的五四运动才真正在文化层面予以突破,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突出的精神成果当在于对人的发现和对女性的发现。妇女和妇女问题第一次被放置在人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内予以考察,并进入启蒙者的思考视野。在这种时代背景和启蒙思想召唤下,一批女性走入社会,涉足文学,破茧成蝶,成为一代新女性。初登文坛的女作家大多以自我生活写起,具有强烈的自我精神传略的特征。她们以自己的人生体验更痛切地体会到了女性生存的不易,故而自觉地充当了女性的代言人。比如庐隐、石评梅、丁玲等,包括了张爱玲的《私语》之类散文,萧红的散文和《呼兰河传》诸多章节,都在作品中或直或隐地描述了她们艰苦奇诡、充满曲折坎坷的人生探索。但除了张



爱玲之外，她们创作生命都比较短暂。庐隐从1925年商务出版社出版其第一部作品至她生命终止，只有十二三年；石评梅开笔于20世纪20年代，1928年就患病辞世，还不到六七年时间；萧红从1932年开始创作，1941年在香港病逝，也不过七八年时间；丁玲从1927年开始写作，1936年去延安，创作风格几经变化，能够代表她女性写作风格的作品大都写于现代。这些女作家如此绚烂的才华只昙花一现，令人扼腕叹息。

集中在这些女性身上有一个关键词尤需引起关注，那就是在五四精神感召下当时所有有梦想的女性为之热血沸腾的一个词——出走。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吹响了激动人心的号角，对此，戴锦华、孟悦在《浮出历史地表》中有一段诗意的表述：“现代女作家因一场文化断裂而获得了语言、听众和讲坛，两千多年始终蜷伏于历史地心的缄默女性在这一瞬间被喷出、挤出地表，第一次踏上了我们历史那黄色而浑浊的地平线。”^①在此前的两千多年里，在皇权、族权、父权合一的中央集权等级制度威压下，在各种政治、经济、伦理、价值等方面的封锁与禁锢面前，女性始终处于社会的底层，她们不得被围困于家族、寄食于人，先是父亲，后是丈夫，然后是儿子，因经济上受制于人，心理上便也臣服于人。女性不能离开家庭独立生存，她们的一生被紧紧捆绑在男人身边。“女性一生都受家庭规定，妇女的本质和地位即她的家庭地位：‘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郊特性》）……妇女在家庭中的从、服是她社会生存处境的统称，在经济上，女人是寄食于人者，从谁便寄食于谁，在心理上，女人从谁便屈服于谁，这便从经济与人格两方面排除了女性对任何生产资料或生产力的占有权。……于是，父系社会又势必以某种符合统治原则的方式将女性重新安插在自身秩序内。这便是家庭和氏族系统所发挥的另一种功能，它将女性之异己、他性的本质尽数洗去，转化为可接受的东西，如转化为传宗接代

①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工具或妻、母、妇等职能,从而纳入秩序。无怪乎女人的一生都逃不脱家庭的规定,只有在家庭里,她才是一种职能、工具而非主体,她才是女、母、妻、妇、媳,而非女性。”^①

与此同时,男权中心的各级统治者制订出各种规范和要求,男子的话语权力操纵着整个语义系统,创造了女性价值、女性形象和行为规范,因之也创造了有关女性的一切陈述。“恰如克里斯蒂娃已指出的那样,女性若想进入这种为男性把持为男性服务的话语体系,只有两种途径,要么,她借用他的口吻、承袭他的概念、站在他的立场,用他制定的符号系统所认可的方式发言,即作为男性的同性进入话语;要么,用不言来‘言说’,用异常语言来‘言说’,用话语体系中的空白、缝隙及异常的排列方式来‘言说’。”^②

在欧洲,主体概念在思想启蒙运动中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然而,如此重要的一个概念,实际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偏斜和疏漏。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作为人的抽象集合的“主体”,实际上并不把女性包括在内。所有历史的、哲学的、政治的行动者,其实都是由男性来承担的。这种状况就像是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描述的:“女人完全是男人所判定的那种人,所以她被称为‘性’,其含义是,她在男人面前主要是作为性而存在的。……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③

现代文学史上的女性以一声“我是我自己的”叛离了家庭,开始了自我寻找、自我成长的过程。这是一个勇敢的历史性姿态,她们选择了娜拉式的出走。“娜拉”是挪威著名剧作家易卜生的剧作《玩偶

①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②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③ 西蒙·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之家》的主人公，她不甘心做家庭的牺牲品和丈夫的玩偶而离家出走。1918年《新青年》刊载了《玩偶之家》的全剧文字，新文化运动先驱胡适、袁振英、鲁迅等人纷纷撰写了与此剧有关的文章，娜拉于是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新女性形象的全部标准，成为女性追求自我价值和独立自由的镜像。

这一代女作家都有形式不同的出走阶段，而出走的人生经历带给她们人生和创作的影响是至为深切的，甚至就此影响了她们对人生的看法、思考的深度，甚至人生的走向。庐隐和石评梅为了理想而出走，在遭遇爱情挫折后先后沉入空虚和梦幻，早早离开人世；萧红为反抗包办婚姻孤身出走，却在经济压力下遭受更多困苦，未得永年；丁玲幸得加入革命阵营，到了延安，然而她的一生更是让人唏嘘慨叹的一生；张爱玲幸而有母亲和姑姑接纳，在光怪陆离的大都市里有了一个落脚点，使她得以从容地创作，然而男人和爱情成为她人生的滑铁卢，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肩负起生活的重担，终至困顿后半生。她们的这些经历拓展了她们创作的内容，并因此形成风格迥异的写作特点。庐隐真诚率直的性格和强烈的叛逆精神，石评梅的哀艳清幽，萧红的对人类愚昧的冷静洞察，张爱玲对人生真相的透彻了解，丁玲对女性生活的敏锐观察等，这在当年就已得到鲁迅、茅盾、傅雷、郑振铎等一代大家的赞誉。鲁迅称萧红为“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说她的作品“力透纸背”，有着毫不逊色于男性的“明丽和新鲜”。茅盾为萧红和庐隐作专论，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傅雷对张爱玲尤为关注，为她写过《论张爱玲的小说》等评论。

而这些女作家的创作确实反映了时代的种种风貌，为当时的文坛注入新鲜的血液。她们的作品各有自己关注的领域，却又在内在精神脉络上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她们都在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后，又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同时在国门大开之日也学习了西方文明，因此她们得以站在一个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历史横断面上来审视和反思中国文化和女性生活。有了这样一个站立的高度，她们的目光

更旷远,更深邃,更能深刻触摸到现实生活中女性悲剧的本质。在结合了自身生存体验之后,第一次给中国文学带来了独立自强的女性主体意识。而在她们小说中表达出的对生命个体,尤其是女性生命的强烈关注,对自然万物的深切热爱和对温馨家园的永远憧憬和追求,构成了一个不自觉的生态场。这些女作家未能受到生态思想的影响,缺乏生态女性主义写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但是触感敏锐的她们却因自我或他人生存的艰难黑暗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酷。她们发自内心地呼唤温馨友善的人际生态,呼唤人们尊重每一个弱小的生命,尊重女性,让生命之花自由绽放。她们通过对女性生命在严酷的社会和男权中心制度压迫下萎败、毁灭的现实案例的描述,昭示了女性面临的恶劣的生态环境和败坏的时代文化生态。这是她们作品的最大价值所在。

第一节 自然精神:庐隐和丁玲

一、五四精神之女:庐隐

庐隐原名黄英,1899年生于福州闽侯一个没落官宦之家,6岁丧父,饱尝人间冷漠。1919年中等师范毕业教书自力积攒学费,插入北京女子高师国文部第一届。1921年解除家中旧式婚约,1923年不顾社会家庭的反对,毅然与尚有妻室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郭梦良结婚,1925年生女儿,同一年,郭因病去世。1928年好友石评梅去世,1930年她不顾社会舆论,与小自己9岁的清华大学学生李唯建结婚,1931年发表《象牙戒指》,1934年因难产于上海去世。她的作品还有《或人的悲哀》《丽石日记》《海滨故人》等,以哀伤的笔调叙写五四青年复杂的感情世界,尤其是一代青年女性追求民主解放和爱情幸福,最终只能品尝到苦果的情形。“人生是什么”焦灼而苦闷的呼问成为庐隐小说的主调。她的作品最早表现女大学生的思想和追求,苦闷和彷徨。